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0.05.027

情绪传播与民族精神品格培育

张小平¹, 蔡惠福²

(1.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2.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随着新传播时代的到来,与事件传播、意见传播相伴的情绪传播正在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景观,也是当下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研究表明,活跃的情绪传播不仅会影响某一时段、某个事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气,而且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培育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负面情绪的传播更容易激发社会的情绪参与,因而很容易助长浮躁、焦虑、抱怨、功利、怨恨甚至是反智主义情绪在社会中的扩散与蔓延,造成社会认识分化意见对立,侵蚀社会文化体系,对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带来损害,深层次地破坏着民族精神品格的思想文化根基。民族精神品格影响民心民魂,事关国运兴衰。现代传媒必须根据培育民族品格、建构民族精神家园的要求,认真思考并努力做好情绪传播的引导、疏导和管控工作,发挥情绪传播在民族精神品格建构中的积极、正面作用,使其消极的负面影响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和消解。

[关键词]民族精神品格;情绪传播;社会心态结构;新闻求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0)05-0194-07

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人即传播人”由应然状态变为实然状态、社会成员的传播欲望和传播冲动得以充分解放、传播权力得到最大化实现之后,与事件传播、意见传播相伴而生的情绪传播便成了信息传播中的新景观,也成了新闻传播研究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课题。有传播学者指出,群体传播“内在地触发了人类感知模式、情感模式、交往行为与传播机制的颠覆性变革,这场变革的特征之一,就是普通个体的认知与情绪的社会化传播,即在媒介化社会中,普通的个体思想情感、认知判断可以通过互联网群体传播表达出来,甚至演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认知与情绪”^[1]。

在对个体情绪亦或少数人的情绪借助现代传播技术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衍变成社会情绪

的机理、路径、特征等有了较多的探讨和了解之后,我们深切地感到,新传播技术助推下形成的空前活跃的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不仅仅是显在的、表象的,不只是左右某一事件的发展走向甚至最终解决,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时段社会情绪的曲折反复,更重要的是,在焦虑、浮躁、偏执、失望乃至怨气、戾气等诸多不良情绪的扩散与蔓延中,不断加剧社会交流对话沟通的难度,对良性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科学价值体系的推广和先进文化形态的建设带来干扰冲击,使某些不良社会情绪沉淀固化到民族性格之中,由此,损害了民族的文化风貌和精神气象,在更深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精神品格的培育、优化和升华。这是研究新传播环境对社会进步影响必须要充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收稿日期]2020-05-20

[作者简介]张小平,男,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蔡惠福,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培育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时期与传播技术革命不期而遇

社会群体的精神品格是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情感心理、价值理念、秉性气质,是“意识、思维和思想、观念等的集结或综合化体现,是主体的意识、内在的情感与理性、禀赋和外在气质的统一”^[2]。比如,我们常说南方人精巧灵秀、柔雅通变,北方人则豪爽刚直、粗犷大气。曾有研究者对湖湘士人的精神品格作过具体研究,认为他们具有狂狷的特征,即既有狂者的进取、刚强的一面,又有狷者退守的一面,将进取、豪放、倨傲乃至蔑俗轻规的“狂者”气质与逸守、谦逊以至淡泊清持的“狷者”气质合为一体,体现出湖湘士人既狂且狷的特点,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便是典型代表。^[3]

就中华民族整体而言,其民族精神品格的至特至伟一直为我们所自豪。“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追求饥者一饱、渴者一饮,以小私有者为自足的民族,而是一个知天知人,彰大理,循大变,无往不通的民族,是经纶万物,驾驭群品,与造化同功,创造圣德伟业的民族。”^[4](序言P.2) 这样一个崇尚精神并以精神立国的民族,其民族精神既有独创性又有包容性、既有连续性又有变革性、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以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为思维底蕴的。^[5] 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之谓,其义就是修中道、尚中德、贵中和的意思。远古先圣之所以以“中”字相称,其意就在于将“中”提升为国家精神和治国理念,秉持中正之道,立于天地之间。由此出发,在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凝聚起“执两用中”“无偏无党”“过犹不及”的道德智慧和中庸德性,并由此化生为中正和善的礼仪文明,积淀成以天下为公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群体整体主义传统。^[2] 当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品格也有其他的概括描述。比如张岱年认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表现为两个命题,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这两种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精神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自强不息”所体现的拼搏精神和“厚德载物”所体现的兼容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刚健中外的精神风貌。这些从不同维度、不同侧面的研究总结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

富、义理高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深厚、高明、广博、悠远的特征。

人既是精神的主体又是精神的客体,既创造精神又被精神所创造。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的今天,我们在对历史的回望和当下的经略筹谋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民族精神品格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福祉实现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不仅为中华民族构建了安身立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家园,支撑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传承,而且也是今天中华民族永葆蓬勃朝气、不断超越自己、自觉自信、走向辉煌的强大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6](P.158)

正如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说:“公元两千年将届之际,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7](P.1) 在我们扎根传统,面向未来,兼收并蓄,汲取精华,为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精神气质、伦理禀赋和集体人格,焕发民族精神的勃然生机而孜孜努力时,前所未有的新传播革命不期而至,成为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在被精神创造同时又创造精神的实践运动中,媒体一直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型构精神世界、培育精神品格的基础性力量。离开了媒体对知识、思想、文化的生产、传播和保存,人类精神家园的建设将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媒介发展史往往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发育史。伊尼斯断言,一旦技术在文化中占支配地位,那么这一技术必然成为整个文化的“结构动因和塑造力量”^[8](P.137)。新传播时代的到来,媒介嵌入人们的生活,手机成为人的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默的大多数”成了“大多数不沉默”,媒介深度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相处方式,媒介对社会精神品格的涵化建设作用动能进一步凸显出来,为我们传承弘扬新时代的精神品格、建设具有新质的精神家园创设了更加有力且有效的条件和环境。媒介文化改变带来的社会思想文化生态的多元化也使民族精神品格的建构涵育面临新的挑战。在主流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各种大众文化形态随着网络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再生产能力,大规模地占领网络虚拟空间,并扩展到

现实场域。这种由意见传播、知识生产、思想形成充分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必然冲击既有的心灵观念秩序。诚然,决定某个历史时期社会精神状况、精神品格的是宏观的思想文化情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综合力量,但是,由于媒介的功能在本质上是创造精神交往的空间,媒介的作用归根到底表现在对人的精神影响塑造上,所以,在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致力于民族精神品格的优化再造时,就不得不高度重视媒介环境和传播生态的深刻变化。

二、情绪传播成为影响民族精神培育的重要因素

关注并研究新的传播环境、媒介文化对培育民族精神品格的影响,正在成为情绪传播不可忽视的视角,情绪的社会化传播也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影响民族精神品格培育的重要因素。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王俊秀的观点,个体情绪与社会情绪密切相关,但社会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简单相加或混合,而是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9]媒体是个体情绪与社会情绪互动、叠加和杂糅的主要载体和渠道,“作为符号的信息是极其复杂的表意系统”,信息的传播不仅仅是事实、意义的传播,还是个体认知、思想、情绪的扩张。只不过有些主观认知和情感通过信息符号的外在形式(音响、文字、图像等)得到了明确、直接的表达,而另一些则隐藏在形式的间隙或文字的沉默之处,等待人们的发掘和解读。^[1]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传播手段有限,情绪的社会传递和感染的时间、空间、速度及精确度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便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的出现方便了情绪传播,但由于进入这些媒体的门槛很高,“个体认知的表达权仅限于具备与大众媒介特质相契合的表达能力的少数个体”,绝大多数“不具备相应才能的普通人”则难以得到“个体信息社会化的机会”。而且,“当个体以某种才华站到大众传媒的平台上,他们的表达马上开始受到大众传播生产机制、意识形态、商业运营法则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切言行都必须建立在对大众传媒顺从、与大众传媒合作的基础上”。^[1]也就是说,传统媒体有着严格的把关调控机制,基本属于单向传播,对于容易引发负面作用的不良情绪往往在传播之前就被甄别、过滤、遮蔽掉了。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社会精英对话语权

的垄断,普通个体作为传播主体自由自主生产信息的权利大大增加,给个体情绪的社会表达带来了充分的便利。按照隋岩的说法,互联网所具有的传播特性促成了社会情绪的空前广泛的传播。一是互联网传播具有即时性、碎片化特征,各类信息尤其是突发事件的即时传播在无形中倒逼用户作出反应,而人在短时间内对碎片化信息作出的反应难免片面、粗率,感性多于理性;二是互联网传播使海量信息处于永无止息的全时性流动中,迎合了情绪的活跃性和传染性特征,满足了普通个体情绪传播的条件;三是互联网是一种多媒体介质,网络中信息符号的能指由文本、图像、动画、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综合构成,比单一的文字、声音、画面更生动直观,更易于情绪的多样化表现和传播。^[1]还有研究者发现,在网络环境之下,情绪可以脱离于唤起该情绪的事实单独地作为信息广为传播的特点进一步凸显。^[10]即使人们不在同一场所,也能通过网络群体传播进行情感仪式互动。也就是说,互动仪式不必非得要求在同一物理空间的“身体集聚”,情绪传播者个人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关联性,跳出个人社会网络,与媒体、网络意见领袖等情感能量较高的主体建立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放大个人情绪。^[1]除此之外,现代传播技术还为情绪传播提供了反复性、多次性的良好条件,可以使情绪传播效果实现更大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加便利、自由地通过网络畅所欲言,直抒胸臆,渲泄情绪,使得社会情绪的“能见度”、流动性、覆盖面大为增强。

社会建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情绪和社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状态具有互构性。^[1]社会精神、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作用于社会情绪的形成、表达和传播,而社会情绪反过来建构着社会精神和社会文化,并间接作用于经济政治的发展。也就是说,它们的影响建构是双向的。新传播技术催生的空前活跃的情绪传播对社会道德、社会思想、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必然会更甚于传统媒体时代,因为情绪表达在相当多的时候可以正面支持和维护社会文化系统,指引着人们的宗教、政治、道德和美学实践,当一个人的行为违背道德规则或者社会共同价值规范时,社会群体就会表现出愤怒、怨恨等情绪,迫使当事人感到愧疚、悔恨,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被群体孤立;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主流社会文化观念时,社会群体往往表现

出赞赏的态度,以正面情绪鼓励这些行为。因此,情绪传播的正面影响能够形成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情绪氛围和环境,能够“限制不受道德欢迎的行为或形成合宜的动机意愿”^[1]。强化理性科学、积极健康的情绪传播,扩大其正面影响,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我们也正在为此而努力。

但是,由于网络的弱管理、弱把关、去中心化等特征,消极的、不良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的、激烈的、充满火药味的情绪也可以通过匿名的以及诉诸迂回、隐蔽的网络语言,肆意流行于网络空间。而且,有研究表明,“无论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能引发再次分享行为,不过,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更能激发人们的分享欲望。相应地,情绪激烈程度越高,再次分享的意愿也越强烈。同时,出于寻求情感支持和社会同情的需要,人们更容易大肆分享高度负面的情绪”,所以,“负面情绪更容易激发公众的情绪参与”^[2],负面情绪的传染性更强。再加上社会结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一些人因落差感、不公感、被剥夺感而产生的心理失衡和心态畸变为消极情绪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所以,从当下的网络情绪传播的实际状况看,消极的、不良的情绪在情绪传播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许多负面情绪一经某个事件的引发,通过“被夸大的修辞”的“造势”和“溢散”在网络上很快就呈燎原之势,引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使隐藏着种种负面情绪由“暗火”变成“明火”。这不仅加剧了整个社会浮躁、焦虑、功利甚至反智主义的情绪,而且很容易造成社会情绪的分化甚至彼此对抗,从而撕裂社会共识,助长社会对立,激化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勒庞认为,大众情绪会受到“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当许多的个人构成一个群体时,就会产生独特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通过彼此情绪上的相互感染,使个人不由自主地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其行为方式与独处时的行为大相径庭,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息,并盲目地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尽管勒庞的这一理论招致大量的批评,但勒庞对集体行为中情绪非理性因素的强调以及对群体抑制个人理性反思能力的观察,应该是具有启发性的。

因新传播环境之下的情绪表达主导权位移而形成的负面情绪的广泛传播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值得重视,它不只是在社会成员情感、情绪的表层显在地反应出来,形成社会动荡,而且日积月累、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也就是说,负面社会情绪的广泛传播不只是表象地、短暂地、阶段性地引发诸如浮躁、焦虑、抱怨、愤怒等不良情绪,还会侵蚀损害社会文化体系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破坏民族精神品格的思想文化根基,更深层次地干扰民族精神品格的涵化、培育和建构。

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情绪的广泛传播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影响会有所帮助。在谈到认识主体的观念建构过程时,皮亚杰指出,作为主体的人在接触外部对象时总是试图以自己原有的相关的“文化图式”去同化客体对象。然而,在同化中主体很可能发现自己原来的“文化图式”的成分与客观对象并不完全一致,于是主体只好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图式”作出调整,形成关于客体的观念。所以,人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主体对客体对象同化或顺应的过程。同化是个体把客体纳入主体的图式之中,这只能引起图式的量的变化;顺应是主体的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因而引起图式的质的变化,促进调整原有图式或创立新的图式。^[11]人的精神品格的形成过程作为一种认识或者心理心态建构的过程,其实也是主体“文化图式”调整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接受的总是一些消极的、不良的、非理性的情绪,亦或说,总是环绕浸淫在由现代传播营造的负面情绪氛围之中,那么,社会个体就会渐渐被这种负面情绪所同化,对原有的“文化图式”产生怀疑或动摇,并作出改变的意愿和行动。这样,他的精神品格就极有可能发生负面变化。而且,无论是皮亚杰所说的“文化图式”还是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变,都是以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为中介的。^[12]也就是说,人的“文化图式”或者“文化心理结构”是在语言的作用下形成的。研究文化,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语言的力量,而新传播格局下的情绪传播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网络环境中的特殊语言形态进行的。这些特殊的语言形式包括文字、图像、表情包等等,大都是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解构了传统构词方式创造出来的,它改变了人们描述世界、叙述事件、表达思想的习惯,虽然这些特殊的语言形式具有灵动活泼、言简意新的特点,但怪异、玄幻、灰色、无厘头、低俗者也不在少数,所以有人将其称为“修辞学的转向”。正是这些另类的网络语言在建构情绪的同时,推动了情绪的社会扩散。沉溺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再加上“模因效应”的作用,就很难使自已不被同化、走向顺

从,而这种同化和顺从很难说完全是进步意义的。

社会情绪属于社会心态的范畴。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情绪与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向共同构成社会心态体系。^[13]因此,可以从社会心态结构变化的视角来认识情绪传播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依照稳定性,可以把社会心态的结构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稳定的社会心态、阶段性社会心态和变动性社会心态四个层次”^[13]。在这四个层次中,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变动最快的、较明显的和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部分属于变动性、阶段性的社会心态,在较长时间内表现稳定、变化缓慢的内容一般指社会价值观,属于稳定的社会心态。而社会心态中最为稳定的是社会性格部分,所以称其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13]该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心态的四个层次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位于结构最内层、处于超稳定状态的社会性格对价值观这种属于稳定的社会心态具有支配和控制作用;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稳定的社会心态自然而然地影响着阶段性、变动性的社会心态。处于社会心态结构外层的阶段性、变动性的社会心态同样受最深层的超稳定社会心态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较近的心态层级即稳定的社会心态的影响。外层的变动性、阶段性社会心态也同样影响和反作用于稳定的、超稳定的社会心态,长期的、连续不断的变动演化会积淀成下一层级的社会心态。尽管外层的社会心态要衍变并进入最内层的超稳定的社会心态(即社会的、民族的性格)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但是这种相互影响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13]

事实也正是如此,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一种又一种社会情绪的形成、扩散和蔓延,社会成员特别是最具活力、被称作“后浪”的年轻一代的生活观、审美观、幸福观已经发生了许多显性的或隐性的改变,对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感于这种变化,不是有人发出了“两代人为什么变成了两种人”的慨叹了吗?这也说明,社会情绪这种外在的、阶段性变动着的社会心态对内在的、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稳定的社会心态确实会产生影响,而且,它对更深层级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也会产生影响,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的沉积、融入、成形,但是这种潜在性是不容忽视的。由此可见,所谓的“超稳定”并不是固定不移、一成不变,社会发展变化越快,社会情绪越活跃,这种由外而内的改变就越快速、越明显。

三、立足培育民族精神品格的高度 优化社会情绪、引导情绪传播

综上所述,民族精神品格影响着民心、民魂,事关国运兴衰,而情绪传播对民族精神品格的建构又至关重要。所以,作为现代传播主体的各类媒体应当站在培育民族精神品格、建设好民族精神家园的高度,认真思考并做好情绪传播的引导和疏解,使情绪传播在民族精神品格的优化培育中发挥积极的、正向的作用,抑制、消除其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防止不良情绪的社会传播,首先要考虑的是优化社会情绪,即努力培养健康、理性、积极的社会情绪。一般而言,先有情绪,再有传播。当然,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伴性,许多情绪是在传播即社会化分享过程中被放大或者发生变异。如果社会情绪总体是稳定的、良好的,那么局部的、个体的不良情绪就很难被引爆,其扩散和蔓延也就没有了先在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与传播具有某种“源”与“流”的关系。“源”净“流”自清,所以,思考情绪传播与民族精神品格的优化问题,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如何培养健康、积极、理性的社会情绪上。也就是说,首先要考虑如何“育”,其次才是怎样“传”的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应该明确把社会心理建设、社会心态建设纳入治国方略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调动社会心理资源。为此,他们提出了若干意见建议,比如,从满足民众需求入手,激发全民奔小康的心理动力,引导民众修身齐家,守法有德,有序参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建设。要引导社会共享价值观念建设,多途径营造共同感,形成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当前,特别要注意营造文化共同感、命运共同感和发展共同感。以中国梦作为全民共同的未来预期,调动文化心理资源,形成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要引导人们把国家的梦与个人的梦结合起来,从个人的梦、家庭的梦开始,逐渐培育超越个体和家庭的梦想。此外,要让民众了解,预期要适度,因为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有困难、有阶段,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摸索、借鉴、配合、妥协、协商、忍耐、等待。^[14]这些认识和策论同样是涵化培育良性的社会情绪之需。其实,这何尝不是传媒从业者应该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呢?因为这些都需要通过有力有效的媒体传播去落实。所以,社会心理学者在论及上述观点时,

特别说明了主流媒体特别是主流新兴媒体的作用,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互联网的普及使社会成员愈发地成为信息消费群、信息依赖群和信息加工群。人文社会环境的作用使人们的心态更加自由,更容易受到感染和动员,也更容易通过信息网络连接成网络结构,即更容易凝聚,也更容易四散。因此,引导培育社会心态,要从现代媒体使用群着手,探索通过媒体引导社会成员认同,形成优良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规律与方法。^[14]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社会心理学者,近几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传媒工作者理应肩负起相应的责任,做好落实核心价值观、培养健康精神、优化社会情绪这篇新时代的大文章,要把自己的工作同培养良好的社会情绪结合起来,从涵养社会情绪的视角思考传播内容和传播方法,做社会情绪的观察者和护理者。在社会情绪出现问题时,及时予以化解,将负面情绪转化成正面情绪,防止负面情绪的固化、衍变,以此降低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和影响,防微杜渐,及时解决问题,确立正确的态度,传播准确无误的信息,以尽快形成正面的社会情绪。在没有明显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时,防患于未然,加强正面引导和教育,让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情绪保持稳定,使媒体真正成为社会情绪的“稳压器”。我们在探讨社会情绪传播的特征机理等基础理论问题时,也应联系实际,加强应用性、对策性研究,为如何培育良性社会情绪提供切实管用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路径上的帮助。

传媒从业者要重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尤其要努力把握互联网条件下社会成员心理变化的特点、机理和规律。新闻宣传往往从传播者本位出发,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不太善于运用整体化、系统化、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思路来梳理分析社会问题,调整社会矛盾,特别不精于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成果来培养社会善意,促进社会信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引入社会心理研究视角,在社会心理的框架之下,将社会情绪研究与舆情研究结合起来,搞好对社会整体以及不同群体社会情绪的调查、监测与研判,掌握了解其变化规律,丰富情绪调控舆论引导的方式技巧,开拓新闻宣传新的路径和模式。

有研究者提出,建设性新闻中蕴含着“新闻求善”的伦理引导与道德规则^[15],即有鉴于自由市场下媒体的商业化、集团化与托拉斯化造就的媒介组

织对商业利益的屈从,加剧了工具理性的滥觞与以人为本精神的衰弱,影响到新闻之善确立的基准与价值的平衡,由此将新闻带入了“伦理之殇”。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回应,要求“在忠于求真、求证、中立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将积极心理学应用于新闻生产流程,重新思考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与责任,以弥补信仰、情感与美德等‘公共善’的缺失”^[15]。有学者称这是一种以服务公共社会、追求人类至善为宗旨的创新范式。在此,我们不对这一观点进行评价讨论。只是想说明新闻在求真、求美的同时,的确有必要考虑如何求善的问题。作为一种新闻伦理,真、善、美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当下的媒介文化中,强调将人类社会的至善作为新闻的伦理责任,有它的合理性,这对于搞好情绪传播的引导与调控也具有启发和帮助意义。据此,新闻应当“把正面情感安置与引入积极的情绪”作为重要诉求,引导人们生发对德性、至善与幸福的向往,追求“心理幸福感”。^[15]建设性新闻中的“新闻求善”理念高度重视西方媒介“偏离社会正常的情感、德性、审美等层次,助长了媒介、人和社会等多重主体间有效沟通圈层的断裂”的痼疾,提出媒介应当“通过加强与公民团体与公共社区之间的对话与沟通来提升媒体与公民之间的信任”。^[15]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如上所述,情绪传播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就是在“茧房效应”之下的圈层极化。持不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各执己见,甚至互相撕扯,从而影响了社会共识的形成与社会和谐。为此,媒体应该大力提倡善意的对话交流,在各种意见观点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准确把握社会变革时期民众需求的多元化、高标准、群体差异化以及真实想法相对内隐等特点,设计稳妥有效的协商对话方案。通过意见观点理性平和的交流,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道德来规范情感和知识的运用,学会用道德良知“为自身立法”,培养善于接受“更佳观点的理性力量”,容纳不一致的观点意见,进而弥合不良情绪造成的隔阂,共建幸福美好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 [1] 隋岩. 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1).
- [2] 王泽应. 论中国精神对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J]. 齐鲁学刊, 2014, (3).
- [3] 朱汉民. 狂狷: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以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为重点[J]. 求索, 2015, (4).

- [4] 司马云杰. 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M]. 太原: 山西出版集团, 2008.
- [5] 楼宇烈.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底蕴[N]. 人民日报, 2016-06-14.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7]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 [8] 埃里克·麦克卢汉, 费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9] 王俊秀. 社会情绪也在成为一种传播信息[N]. 北京日报, 2017-08-14.
- [10] 赵云泽, 刘珍. 情绪传播: 概念、原理及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思考[J]. 编辑之友, 2020, (1).
- [11] 让·皮亚杰[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让·皮亚杰/8159030fr=aladdin>, 2010-05-11/2020-04-20.
- [12] 唐凯麟. 传统文化三题[J]. 求索, 2018, (3).
- [13] 王俊秀.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4, (1).
- [14] 杨宜音. 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心理取向与引导[N]. 北京日报, 2016-01-11.
- [15] 陈薇. 建设性新闻的“至善”与“公共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10).

(责任编辑 李静丽)

Spread of Emotions and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

ZHANG Xiao—ping, CAI Hui—fu

(*School of Military Cultur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PLA, Beijing 100081, China;*
School of Politic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PLA, Nanjing Jiangsu 210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 era, spread of emotions,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spread of events and spread of opinions, is becoming a new landscape of inform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 hot topic of news communicational research at pres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ctive spread of emotions can not only influence th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ethos of a certain period or event, but also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 Especially the spread of negative emotions is more likely to stimulate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us it is easy to lead impetuous, resentment, anxiety and unease, utility and even anti-intellectualism mood spreads in the spread of the society, causes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pposing opinions, and eros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system, especially to the core values formation damage, deeply damage national spirit character of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 affects the soul of people and is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and building a homeland of national spirit, modern media must think carefully and make efforts to guide, relieve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emotions, so as to give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spread of emo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 so as to suppress and eliminate its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maximum extent.

[Key words] National Spirit and Character; Spread of Emotions; Structure of Social Mentality; Journalism Seeking Goodness